



單一與多元：對世界主流文化之省思

[墨西哥]霍藤莎・居雷爾・貝瑞

(蒙特雷科技大學，墨西哥 新萊昂 蒙特雷)



[摘要]文化世界與每個人都有關係，因為它是人類自身最純粹的表達方式之一。在21世紀，至少在地理政治層面的兩極對立已經消失，代之而起的是大規模的重組，不同民族組成了不同的文化、政治、經濟“馬賽克”，每一民族都強調自己的特殊性。這無疑構成了地緣政治身份和文化身份，也表明了文化世界不僅是複雜、多元的，也是異常豐富的。那種認為“世界主流文化”指的是一種“世界廣泛共有的文化”無異於烏托邦夢想，因為它忽略了人性的多樣性或多元存在。但這並不意味着多元文化領域像一盤散沙，不可能找到共同之處。祇不過，如果概念不被限定的話，極易招致意義不明。最合適的辦法是將“文化”限制在文化領域內，使用“類比詮釋學”，以更好地認識多元文化、欣賞多元文化，考察它們對當今世界的影響和貢獻，預測它們未來的投射。至於多元文化主義與文化間隔所帶來的“文化認同”、“文化認可政策”、“民族榮譽與人權”、“尊嚴與人人平等”等問題，需要在不同文化之間展開對話，相互認同對方的政策，在差異中相互尊重。這既是個人的義務，也是各國政府和社會的責任，需要不斷地付諸行動，否則就找不到解決問題的機遇。

[關鍵詞]單一文化 多元文化 世界主流文化 交流 認同 共生

[作者簡介]霍藤莎・居雷爾・貝瑞（1949—），女，生於墨西哥城，1981年獲得西班牙納瓦拉大學哲學博士學位，2008年起擔任國際價值哲學學會（ISVI）墨西哥分會會長，現為墨西哥蒙特雷科技大學研究員/教授，主要從事價值哲學研究，代表性著作有《道德與價值觀》（*Ética y valores*）、《存在與價值觀的本質・二十一世紀價值論》（*Ser y esencia de los valores. Una axiología para el siglo*）、《教育哲學是什麼？》（*Qué es la filosofía de la educación?*）等。

Title: Culture and Cultures: Brief Reflections on the Mainstream Cultures in the World

Abstract: Everyone has a relation with the cultural world , as it represents one of the purest expressions of man's own identity. In the 21st Century, bipolarity was disappeared at least at the geopolitical level, which has been subsequently replaced by large-scale refitting. Different nations made up the mosaics consisting of different cultures, politics and economies, and every nation is putting emphasis on its own particularities. Undoubtedly it has formed both geopolitical and cultural identities, which indicates that the world of culture is complex, diversified and immensely rich. The recognized "mainstream culture in the world" refers to a kind of "worldwide common culture", which is nothing less than a utopian dream as it ignores the presence of diversity. However, it does not imply that the area of multi-culture is like a sheet of loose sand and is impossible to find anything in common. Equivocality may happen if the concept is not confined. The most suitable approach to this is to apply "analogical hermeneutics", which helps people realize and appreciate the diversity of cultures, as well as to study their impact and contributions made to our world today and

to predict their projections in the future. Intercultural dialogue, policies of mutual recognition and reciprocal respect within diversity are necessary for the issues brought by multiculturalism and interculturality, such as "cultural identity", "policy on cultural recognition", "national honor and human rights" as well as "dignity and equality for all". This is not only an obligation of an individual, but also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different governments and societies. Continuous actions are necessary in order to grasp the opportunity to solve the problems.

Keywords: monoculturalism, multiculturalism, mainstream culture of the world, interchange, recognition, co-exis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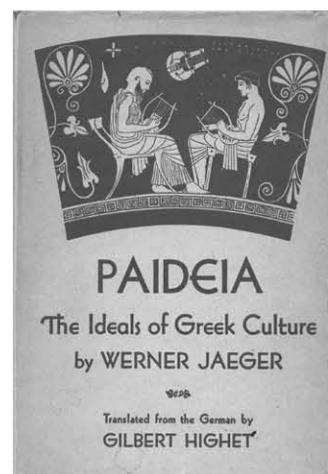
Author: Hortensia Cuéllar Pérez received her PhD in philosophy from the Universidad de Navarra. Currently she is the professor/researcher at the EGADE Business School at Tecnológico de Monterrey in Mexico City and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studies of Ethics, Axiolog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當今世界是否存在著主流文化？這是一個頗具爭議的問題。如果說有，這個問題就會變得異常複雜，因為隨之而來的問題是：“從哪個角度說有？”也許有人認為，在柏林牆被推倒之前，在政治角度應該是有的。那麼，在柏林牆被推倒之後，隨著蘇聯的解體，至少在地理政治層面的兩極對立已經消失，代之而起的是大規模的重組，不同民族組成的文化、政治、經濟“馬賽克”，每一民族都強調自己的特殊性，這無疑構成了地緣政治身份和文化身份，也表明了文化世界不僅是複雜、多元的，也是異常豐富的。

一、“文化”是什麼？

文化與每個人都有關係，因為它是人類自身最純粹的表達方式之一。“文化”一詞來自拉丁語“*cultura*”，意思是耕作或培養；與拉丁語動詞“*colere*”連接到一起，指耕作或飼養。羅伯特（E. Robert）和帕斯特（B. Pastor）經過研究發現，動詞“*colere*”來自印歐語系的“*kwl*”，意思是“改變，旋轉”。^①所以，後人在談論“文化”的意涵時，更多指的是通過對某人“培養”後所發生的內在變化，即一個人、一個社區、一個族群或一個民族以和平的方式經過“培養”後都可以發生改變。這種“培養”，當然指的是教育。這就是為什麼古羅馬的哲學家西塞羅（M. T. Cicero, 前106—前43）在《論演說家》中談到“*cultura animi*”時，將其看作是“精神教育”，用以區別“*cultura corporis*”。後者主要指耕作，即農業中的土地耕作。

瓦納爾·耶格（Werner Jaeger, 1888—1961）在《卓越教育：古希臘文化的理想》（*Paideia: The Ideals of Greek Culture*）一書中告訴人們，古希臘人用“*paideia*”一詞來指“卓越教育”，即從精神和物質多個方面對自由人的性格進行培養。在那個時代的思想家眼中，奴隸或沒有自由的人是不能接受“卓越教育”的。有些人如婦女和兒童，雖然是自由的，但不參與公共生活，也不能接受“卓越教育”。^②儘管古希臘人不僅在個人層面，在政治、社會層面或社群主義的層面都有伽達默爾（H. G. Gadamer, 1900—2002）所稱的“*Bildung*”（教化），即“整體構成”（*integral formation*）與德行培養（德性）相連接，但這種構成式教育是以一種帶有偏見的方式進行着。因為，它像每個柏拉圖式的概念一樣，主要集中在哲學家和自由人身上，以便讓他們在公民大會上



瓦納爾·耶格：《卓越教育：古希臘文化的理想》（英文版）

① Edward Robert, Bárbara Pastor, *Diccionario etimológico indoeuropeo de la lengua española* (Madrid: Alianza Editorial, 1996), 89.

② W. Jaeger, *Paideia: The Ideals of Greek Culture*, vols. I-III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5), 1260b.

發揮公民的作用。亞里士多德（Aristotle）也部分地贊同這種做法，這在其著作《政治學》（*Politica*）中有所論述。這種剝奪婦女和非自由人的政治文化權利的做法，直到多個世紀之後才得以解決。

拋開古希臘人對婦女和非自由人的歧視，我們可以發現，意在提升教育和文化水平的“卓越教育”，是古希臘文化的理想所在。這也反映出，“文化”的原始意義和古典意義是“構成”（formation），即通過培養來接受道德教育。經過培養的這個人會被認為是受過教育、有文化，成了一個有教養的人，一個聰明有才智的人。由於他／她的人生智慧，這個有道德的人當然就是一個好人，在人前人後都不會發生變化。

不僅西方這樣認為，東方中國的儒家思想中也是這樣認為的。孔子說：“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①在此——人類智慧——中華文化與講求靈感的西方文化可以握手。這就是“跨文化”（transculturality），它超越了時空的邊界，用以培養人生智慧。

追溯歷史，人類文化史是動態的、開放的，不是單一面孔，而是斑駁的多元文化面孔。因此，到早期基督教時代，古希臘的“卓越教育”開始被稱為人文學科。人文學科的意思很豐富：人的培養作為古希臘遺產的一部分，既要繼承下來，又要符合其本質特徵——智力和道德教育（因此，像“邏輯”和“德性”培養之類的學科很重要）；再加入文化和宗教因子——要有信仰之光，要相信上帝。這就是為什麼信仰知識——相信上帝——是知識的另一個源泉的原因。這種知識不同於理性，但也不反對理性，托馬斯·阿奎納（T. Aquinas, 1225—1274）在13世紀時花費很大力氣證明了這一點。

基督教對文化的貢獻在於融合了猶太傳統和古希臘、古羅馬傳統。這種融合的標誌，是把信仰和理性作為真實知識的兩種可靠的來源。這在大學剛剛誕生時就得到了合理的實踐，時間是在公元9—13世紀。在最先成立的這些西方大學中，如博洛尼亞大學、巴黎大學、牛津大學、薩拉曼卡大學，都把古希臘、古羅馬教育的基礎課程主要是“人文科學”（trivium and quadrivium），與哲學和神學一起組成了大學的基本課程；尤其是在使用拉丁語為官方語言這一點上，明顯看出受古羅馬的影響。

之所以強調“教育”在“文化”中所起的重要作用，這與“文化間性”（interculturality）和“跨文化”有關。從大學出現的那時起，既被認為是杰出的高等教育機構，也是弘揚文化、傳播文化的陣地。正如它的名字“unus-versus-alia”（大學）所暗示的那樣，作為一個瀰漫着強烈的人文氣息的機構，它除了科學的一面外——與各種各樣知識的開放和教育相關，還在不斷地尋求真理、善——一種和諧、公正、隱逸、合作、平和的生活。

由於大學的行為活動和知識領域（科學、哲學、藝術、政治、經濟，等等）日益朝向傳播各個國家的文明與文化，朝向為“人”服務，那麼，作為把精神生活凝聚到行為活動中而為人類服務的人文學科工作者來說，就應當通過他們的教學與智慧讓人們進入到文化的廣闊天地中，去創造文化、欣賞文化、傳播文化。而那種違背弘揚真正人性的行為——不管是來自大學內部還是大學外部——都是一文不值的，因為它披着寬容接受的外衣，幹着反文化的勾當。例如，恐怖組織宣揚的“暴力文化”，一些人或明或暗地贊美“血腥暴力”，這與希特勒的行為無異；再有，那些試圖把“毒品合法化”看作是“文化進步”的人，實際上是為了尋求自己或集團的利益。

有關文化中“人性”與“理性”這個主題，不能不提及15世紀歐洲的文藝復興運動。它通過追溯古希臘文化的理想，用文學、藝術來凝聚基督教精神，強有力地推動了“科學理

① 《論語・學而》〔CONFUCIUS, *The Lun Yü in English* (Hong Kong: Confucius Publishing Co Ltd), 16〕。

性”的發展，在大發現時代和跨洋航海旅行中，如1492年發現了美洲，使整個世界從地理角度統一起，各大洲和各種不同的文化開始被人們所熟知。因而，“工具理性”誕生了，其高峰是康德的“自由理性”（autonomous reason）。這在其著名的格言“大膽求知”（*Sapere aude!*）中表達出來，成為了啟蒙思想的中心。它與法國大革命一起，宣揚全人類應該“平等、博愛和自由”，具有強烈的人文主義智慧。但是，啟蒙運動無限崇尚人的理性和科學的力量也帶來了一系列問題。在經歷了20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以及大戰帶給人類的暴行後，人們深刻地認識到：有必要限制工具理性和權力意志，因為人類理想構想的一切事物對於人性和文化來說並非都是最好的。於是，便有了1948年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的誕生。

近些年來，後現代運動與哲學解構主義一起指向了理性的有限性。當代人文主義也一樣：在贊美科學發展的同時，也不斷地提出警告，希望科學知識的成就是為人類服務，而不是用來毀滅人類或打破全球平衡狀態。因為，科學的主旨是促進世界的發展，提高人類的發展指數，提高文化、經濟、生活水平，與疾病和饑荒做鬥爭，促進社會公平，尊重每個人的權利，最終目的是建立一個更為平等、更為公正、更為和平的社會。所有這些，都是文化的表現，都是對人類的關注。

二、“多元文化”指什麼

任何人文主義的表現形式都是包容性的，它尊重文化多樣性和多樣性的豐富表現，倡導在不同派別中進行對話與合作。這樣一來，就會出現一個問題：多元文化是什麼？它們是不是還像黑格爾（G. W. F. Hegel, 1770—1831）所說的，是人類精神的客觀表現和文明表現？答案是肯定的。因此，當我們談論“世界文明”、“世界主流文化”時，指的不是一種“世界廣泛共有的文化”，因為這是不可能的，是烏托邦夢想，它忽略了人性的多樣性或多元存在。文化之所以表現出多樣性，與人類自我理解的諸多因素有關，如歷史語境、地理政治環境、經濟、人種、種族、語言學和宗教等等，甚至自然環境的豐富或非豐富性因素也會造成各民族文化的不同表現。例如，在北極地區生活的因紐特人，在赤道森林中生活的東非人，在普埃布拉生活的墨西哥人，在北京生活的中國人，所表現出的文化差異是相當大的。

這是不是意味着，多元文化領域像一盤散沙，不可能找到共同之處呢？答案是否定的。儘管“多元文化”是以許多不同的方式表現出來，它也有相似的用途，祇不過，如果概念不被限定的話，極易招致意義不明。例如，在日常生活中，它經常以某種方式被使用，大家都明白，但依然不準確，最常見的有：“這人很有（文化）教養”，“這部著作具有重要的文化價值”，“打招呼是有禮貌有文化的象徵”，“那種說法是沒有文化的表現”，“這個社會缺乏共同的文化價值觀”。在這些例子中，人們直覺地意識到，談到有沒有文化時，無論是肯定還是否定，都與其要表達的“價值”、“用途”、“習慣”、“態度”、“觀念”等概念有關。這也就是為什麼瑪麗婭·馬丁內斯（A. M. Martínez）在《文化哲學·當代鏡像》中認為：“看上去我們生活在單一文化中比較滿意，對於相同的生活、習慣和使用情況感到比較舒適，但我們很難給‘文化’下一個準確的定義，因為表現文化的方式是多元的、異質的和不準確的。”^①她說表現文化的方式是多元的，其異質性就是其用途時，她是對的；但她說很難給文化尋找一個準確的定義時，她是不對的，因為這排除了其他合理的定義。這就是為什麼概念不明、方法不明和意義單一都不是解決人類單一文化或多元文化這個大問題的最佳途徑的原因。最合適的辦法是求同存異。如果我們想要更加準確地理解“文化”意義的

^① A. María Martínez, “Filosofía de la cultura. Reflexiones contemporáneas”, *Diánoia* 60 (2008):205.



話，祇能聽從毛里西奧・伯肖特（Mauricio Beuchot）的建議，在文化領域內使用“類比詮釋學”（*analogical hermeneutics*）的方法。

所謂“類比詮釋學”，是指在準確與非準確之間選擇一條“中間道路”：“類比詮釋學試圖打開狹窄的單一詮釋的有效性，但同時對有效性的範圍進行限制，因為意義不明產生的詮釋太多，所以不可能有唯一有效的詮釋，但依據層級可以有一組有效的詮釋。”^①它有助於從概念上澄清文化的複雜廣泛以及多樣化表現，並將相關研究向前推進。

如果我們把文化領域作為人類的現實存在，它會與身份、生產、表達和新事物的發明相聯繫（它是創造力、創新和創業精神的全部內容）。這不僅體現在不同文化範疇和不同文化中，在共時和歷時層面上也是如此。作為一個很好的工具，“類比詮釋學”體現了亞里士多德與伽達默爾兩人學術貢獻在當代的一種混合。出生在斯塔吉拉（Stagira）的亞里士多德通過“類比”，從單一保守主義的難點中和歧義導致的概念分散中找到了解決辦法；伽達默爾則在詮釋理念上開闢了另一條路徑，但至今還未能得到很好的探索——儘管狄爾泰（W. Dilthey, 1833—1911）從施萊爾馬赫（F. Schlaiermacher, 1768—1834）的靈感中受到啟發，提出了作為詮釋工具的詮釋學，並闡明了許多科目的性質。

在文化領域，使用類比詮釋學，能讓我們把路徑放得更開，認識和評價多元文化，推動多元文化“共生”（當然，也不要放棄批評的態度），通過文化和哲學思考，努力做到人對自身的理解，以便更好地認識和欣賞多元文化，考察它們對當今世界的影響和貢獻，預測它們未來的投射，這就是“跨文化主義”（*interculturalism*）。因為，多元文化世界是人類活動的廣闊舞臺，誰也不能離開文化單獨存在；尤其是在遠程通信技術、互聯網、社交網絡出現後，人類已經生活在“地球村”或“大屏幕”上，對得到的各種信息有了更深刻的瞭解，這些信息或許是表面化的東西，或許帶有偏見，但至少可以當作數據來看待。

目前，任何人或任何一個特定民族的文化特點或身份特點都不可能處在隱匿的狀態。從全球化層面看，重大的文化潮流會對人們的生活產生影響是確切無疑的。在西方，文化運動的發生皆源自古希臘的思想，基督教文化的發展就是最為典型的例子。就東方文化而言，古印度、中國的影響也是顯而易見的。特別是有着幾千年古老文化的中國，目前已成為世界矚目的中心，其政治、經濟、社會和哲學模式已使其變為“世界工廠”，其在公、私層面上對世界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影響都是不可避免的。

21世紀是全球大規模整合期，由不同民族板塊形成的文化、政治、經濟共同體，有着各自的特殊理論，提供了地理政治身份，因此也是文化身份，如歐洲共同體、東亞和東南亞國家共同體、拉丁美洲共同體、盎格魯撒克遜共同體等。2013年聯合國《人類發展報告》認為，近十年來，不僅中國作為一個大國出現，像印度、巴西、南美地區和土耳其也在不同程度上發展迅速、成就巨大。如果這種趨勢繼續下去，它們的發展會成為常態。這除了對於減少這些國家的貧困人口有巨大的促進作用外，它們的文化影響也會變得越來越明顯。另一方面，歐洲共同體也在迅猛發展，未來完全可以克服目前存在的經濟和文化頹勢。在美洲，儘管美國內部的問題較大，又面臨着來自全球的挑戰，但它依然是世界最大的經濟大國，其模式和人生方式仍會成為世界不少國家效仿的範例。

隨着交流渠道的便捷，多元文化主義與文化間隔也帶來了“文化認同”、“文化認可政策”、“民族榮譽和人權”、“尊嚴與人人平等”等問題，使得文化充滿矛盾。解決的辦法是：在不同文化之間展開對話，相互認同對方的政策，在差異中相互尊重。在這方面，我贊

① Mauricio Beuchot, *Hermenéutica Analógica. Hacia un nuevo modelo de interpretación* (Mexico: UNAM, 2000).

同加西亞 (E. D. García) 追隨貝當古 (R. F. Betancourt) 所主張的，“相互認同是從具體的現實生活中開始的，與對方改善關係是通過密切的聯繫開始的，也就是，不要通過概念將其限定在一種可能的理性關係中，而是將自己放到受到影響的位置上，或能够在日常事務中被對方觸摸到”。^①此外，一定要考慮這個事實，“文化間性”強調，在價值觀、世界觀、人生觀方面，要相互交流、相互豐富，要瞭解多元文化的傳統並尊重這些傳統。這就是多元文化的認同問題。要知道，中華文化、特奧蒂瓦坎 (Teotihuacan) 文化、希臘文化在許多方面都是不同的。這也包括文化產品，即中國的長城與希臘的帕台農神廟 (Parthenon) 或墨西哥阿納瓦克 (Anahuac) 高原上的太陽金字塔也是不同的。當這些文化產品被人欣賞、與人共享時，就成為了人類文化財富的一部分，變成了人類共同的遺產，對所有的人都有意義。另一個範疇——“跨文化”，在此也非常明顯，更多地與文化世界相連。從文化層面看，跨文化是永恒的，儘管它起源於特定的時空中，其歷史性不能抑制其價值，因為它以極為純潔的方式表現了人的靈魂。

三、為促進文化交流與發展做些什麼？

文化，以及與文化相關聯的活動是非常廣泛、可交流和公共的，在公與私層面上或多或少都存在着。在私人層面，一個有教養並受過教育的人，其優雅與禮貌很容易被人感受得到；在公共層面，那些支持或反對文化活動的人也會影響到其他人。作為政府的領導者，有責任促進文化的交流與發展，以便使自己的文化得到世界人民的欣賞與認可；同時，生活於其中的人們在相互的工作關係中也應該創造有利於熱愛、促進、尊重本國文化的良好氛圍，而不是阻礙它們。

對於倡導各國應該促進本國文化（或多元文化）的發展，將此看作是對當今世界的貢獻，也許會有人提出質疑，理由是：全球化帶來了不同國家、不同地區、不同民族、不同信仰的人口的大量涌入，對於這些新移民，各國也給他們提供同等的機會了嗎？按照孔子的觀點：“人能弘道，非道弘人。”^②這說明，為了在各方面尋求新的路徑，必須做艱苦細緻的工作，在不同文化之間建立一種“認可政策”（policy of recognition）。這似乎不太可能，但可以嘗試。首先，通過公開對話和合作的態度來保障基本的人權，尋求建立正義與和平的秩序。這是一個戰略性問題，需要全球每個國家、每個公民奉獻自己的智慧和想象力，需要國際組織如聯合國的參與。其次，在實際操作層面，每個國家必須建立公共政策或調整其公共政策，尊重歷史和傳統，促進其自然財富和文化財富的共同發展；熱切鼓勵有創造性的人，如發明家、藝術家、文化倡導者，以及哲學家、社會活動家等，通過他們的聰明才智，鑄造出人類的不同側面，這就是衆所周知的“文化”、“多元文化”和文明。而所有這一切，又都離不開教育。這既是個人的義務，也是政府、社會的責任，需要不斷地付諸行動，否則就找不到解決問題的機遇。

為了說明這個問題，我以我的國家墨西哥為例，對這個國家的特點、多元文化和“文化間性”的發展進行梳理。

與中華文化、希伯來文化、古希臘文化、古印度文化和古埃及文化相比，墨西哥的歷史文化傳統只有七百年時間（自公元1325年始），但其歷史卻充滿了多元文化。因為，墨西哥不是一個單一面孔的國家，而是容納了多種面孔，甚至可稱之為“多面墨西哥”（many

^① E. Dora GARCÍA, *Filosofía de la cultura. Reflexiones contemporáneas. Horizontes y encrucijadas* (México: Editorial Porrúa/UNESCO/Tecnológico de Monterrey, 2011), 64.

^② 《論語·衛靈公》(CONFUCIUS, *The Lun Yü in English*, Chapter Fifteen, 28).

Mexicos）。作為一個民族國家，這種面貌與其歷史和不同階段的發展相一致，並包含有多民族、多種族、多元文化、多種語言、多種神話觀念、多種宗教信仰，以及對自己的歷史、過去、現在、未來的自我認識。

墨西哥的歷史是隨着1325年特諾奇蒂特蘭（Tenochtitlan）城的建立而出現的，它很快便成為阿茲特克（Aztec）帝國的商業、文化和宗教中心。第一批居民把站在仙人掌上正在吞食蛇的鷹作為自己的符號象徵，也成為了墨西哥國旗上的一個象徵符號。

在阿茲特克之前，
墨西哥的國土上還發現了瑪雅文化、奧勒麥卡斯（Olmecas）古印第安人文化、托爾提克（Toltecas）文化、札波提克（Zapotecas）文化、霍奇米爾科



墨西哥國旗上的鷹食蛇



特諾奇蒂特蘭（Tenochtitlan）城復原圖

（Xochimilcas）文化、特拉斯卡拉（Tlaxcalans）文化，等等。但是，墨西哥的歷史文化記憶並非就此結束。

隨着1492年美洲的發現，西班牙人於1521—1525年間征服了阿茲特克帝國，墨西哥成了西班牙的殖民地，進入到了被殖民的時期，持續了三百年的時間。1810年，米格爾·伊達爾戈—科斯蒂利亞（Don Miguel Hidalgo y Costilla）宣佈獨立戰爭開始，十一年後，墨西哥於1821年獲得獨立。

在進入到獨立的墨西哥時期後，雖然起起伏伏，但從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教育等角度看，墨西哥作為一個民族國家已經獲得了身份認可。當代墨西哥在身份建構方面受到來自三方面的影響：前西班牙時期；殖民時期；墨西哥獨立時期。這三大影響，依據時間和地點的不同，可被詮釋為多樣世界、人生的多種景象、生活的多種模式和多種方式，與一個國家或民族即將來臨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教育組織的模式平行發展。這導致一種混雜狀態，可以作為一個案例，對一個民族的特別的文化範疇進行系統的分析。例如，墨西哥獨立後，問題就變成了：誰是真正的墨西哥人？是出生在墨西哥的西班牙人，還是西班牙人和印第安人通婚所生出的混血兒？我相信，我們現在已經找到了答案：墨西哥人就是出生在墨西哥這塊土地上的人或者是加入了墨西哥國籍的人，兩者沒有區別。但是，身份不僅是政治上的，從廣義上講也是文化上的，因為墨西哥人一般都會愛自己的傳統、自己的歷史，為自己的國家感到自豪。

帶着墨西哥人這樣明確的身份，我們凸顯出了“共生關係”（symbiotic relationship）。表現我們民族文化維度的主要有這樣幾個方面：民間傳說，藝術，歌唱，舞蹈，服裝，烹飪等。墨西哥文化已越出了本國的界限，希望作為友誼的象徵與世界各國文化進行交流，願相互之間的關係公正、和諧、和平。我們的價值觀有很深的根基，如愛家庭、愛孩子、愛祖國、愛傳統，以及對朋友美德的欣賞、對宗教信仰的贊同、對來自其他民族和地區文化表現形式價值的認可。我們敞開胸懷接納那些能使我們變得更美好的事物，同時也願意與大家一起來分享我們的價值觀。

[編者註：此文的初稿原是作者為參加2013年9月由湖北大學在中國武漢市舉辦的“中國與世界：文化發展論壇”提交的論文；應編者之邀，作者又對初稿做了較大的修改和補充，由河北師範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南開大學外國語學院博士趙長江翻譯，本刊擇要發表。]